

黄仲炎《春秋通说》特点与思想试探

曹姣姣

(湖南大学 长沙市 41000)

摘要: 宋人黄仲炎的《春秋通说》的特点和思想是在宋代疑经的学术氛围和民族矛盾激烈的历史环境下共同塑造的,其特点有三:一是疑经疑传,黜褒贬,立教戒,二是臆想猜度,结论武断,三是比附史实,经史互证。其思想旨趣大致有四:一是崇王黜霸,二是重视伦理,三是民本思想,四是华夷之辨。

关键词: 黄仲炎 《春秋通说》 特点与思想

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识码:** K2

黄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南宋宁宗、理宗时人,一生穷经笃古,老而不第,《春秋通说》一书成于绍定三年,端平三年奏进于朝,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以及乾隆时期朱煌刊本等。《四库全书》中著录的宋人的春秋学著作达三十八种,《春秋通说》即是其一,四库馆臣也因为其“立意明白正大,深得圣人之意,盖迥非安国所及”而将其列于胡安国的《春秋传》之上,也可见其在春秋学史中的价值意义。

中唐时期的啖助、赵匡、陆淳一派开启了融通三传,直探经义的研治《春秋》的新路径,这也为有宋以来讲求义理,疑经惑古的风气开了先河,黄仲炎的《春秋通说》即是此种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同时又因为宋代内忧外患,尤其在南宋时北方半壁江山被金人占领,因此宋儒在研究《春秋》时,常常会有感而发,阐释经意时往往因现实之关怀而带有时代的特色,

内外两种因素一起塑造了黄仲炎《春秋通说》的阐释取向,本文试着从特点与思想两个方面来探究《春秋通说》,以管窥南宋一般士人之思想与心态。

一:《春秋通说》的特点

1 疑经疑传,黜褒贬,立教戒

继承北宋以来疑经之风气,黄仲炎对历来儒生所尊奉的春秋三传及其经典注疏提出怀疑,最明显的即使对春秋书法的不满,所谓春秋书法,赵伯雄在《春秋学史》中的定义是:“孔子在遣词造句,书与不书或怎样书中所表达的褒贬予夺。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①可见《春秋》学中“例”是春秋笔法的重要内容,而黄仲炎恰恰反对这样的解经方式。在其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凡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贬恶也,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

^①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页149。

则皆指曰，是褒贬所系也，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由汉以来见谓明经者不胜众多，然大抵争辨于褒贬之异，究诂于类例之疑，滓重烟深，莫之澄扫，而春秋之大义隐矣。”如桓公即位例，《公羊传》中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①何休对这一条的解释为“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恶。”通过更幽深“直而不显”“讳而不盈”的笔法来写桓公弑隐公的罪恶；《穀梁传》中载：“继故不言即位，正也……继故而言即位，是为与闻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②可见两传都认为《春秋》中书不书即位是有例可言，变例即能看出孔子微言大义中的褒贬取向。黄仲炎否定这种说法，他通过比附周天子即位改元之礼，认为诸侯之礼也应当相同，即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君柩前即位，逾年改元：“书公即位，言非礼也，古者旧君既歿，嗣子必以君命即位于柩前，如《尚书·顾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诰》，诸侯讫王，乃释冕服反丧服，盖君臣父子之义于此两得焉，即王者之事可以知诸侯之事矣。”^③黄仲炎将鲁公即位的史实纵向分析得出“鲁之隐庄闵僖成襄皆合此礼，故春秋不复以即位书之，若夫桓文宣成昭既于君歿之日立为君矣，又复于明年岁首行即位之礼，以夸于众，执丧而冕，此春秋所以书也。”^④书即位反而不正，是不能遵礼的表现。又如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一条，何休对《公羊传》的注为“不言天王者，桓行实恶，而乃追锡之，尤悖天道，故云尔。”^⑤范宁注《穀梁传》时也同意不书天王是贬斥“明非义之。”但是黄仲炎认为不称天王，是因为王，天王与天子的称呼都一样，考诸他事，书天王时，所系之事也多有不合礼制之处，因此称谓褒贬之例尤多荒诞，至于所寄托的褒贬感情则直接由书写的事情中看到，即黄仲炎的原则“若夫書其事，即見其罪，不以去天為貶也。”

但黄仲炎虽反对褒贬，却并不完全反对《春秋》有例。因为黄仲炎认为《春秋》是由鲁史笔削而成，是古文经学家的看法，因此他虽然反对一字褒贬的书法，但也承认有继承鲁史书写体系中通例的存在以及孔子少数的独出心裁的例，其自序中言道：“夫春秋固有以只字垂法者矣，如加王于正，削吴楚僭号而从其本爵之类是也，而非字字有义也，亦固有所谓例者矣，如书其君歿曰薨，外诸侯曰卒，内大夫书卒，外大夫不书卒之类是也，此皆通例也。”

①[汉]何休注 [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 119。

② [晋]范宁注 [唐]杨士勋疏《宋本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页 83。

③ 黄仲炎《春秋通说》，清通志堂经解本，本文按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标页，下不赘述，页 14。

④ 《春秋通说》，页 15。

⑤ 《春秋公羊传注疏》，页 210。

除此外，黄仲炎还认为孔子还贯穿着一些原则，如为内讳与为王者讳等，如闵公之被弑而不言弑，是因为“内讳故不言弑，其不地则弑自见矣。”

黄仲炎在否定《春秋》书法的同时，认为孔子的本意是教化与鉴戒，而其载体是书写的史实。他认为孔子之后，庄周和孟轲最善于道春秋，“昔之善论春秋者，惟孟轲氏，庄周氏，为近之，轲之说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以戒言也，周之说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几孔子之志也。”“教”者在于能“道名分”，“戒”者在于“使乱臣贼子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道：“春秋有教有戒，其教存乎书法，其戒存乎事实，而无褒贬，盖一扫言例之拘，而毅然直摅胸臆者。”是对黄仲炎阐经特点下的最好的注脚，而教化与鉴戒又是一事两面，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一条，“春秋书大夫卒有二义焉，一以明君臣之义，一以见当时专用公族为大夫之非，明君臣之义者所谓教也，明当时专用公族为大夫者所谓戒也。”总之，黄仲炎发挥春秋的义理，更多是通过三家注的凡例前后矛盾处批评建立的，他的教戒观对于春秋三传的阐释也是一个纠偏补弊的过程。

2 臆想猜度，结论武断

黄仲炎的部分结论有臆说武断的成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不免于好为异说，至于触类引伸，旁通槩论，往往涉及后代史事，断其得失亦非释经之正体，独其文辞条畅而议论亦严正不苟，有足取者，况春秋因史以成经，故凡言史者必以春秋为权度，仲炎引史以证春秋而即执春秋以断史”。这种评价是肯綮的。

黄仲炎习染宋人解经的毛病，喜欢义理断经。书中常常出现引用《孟子》的话来解经，这正是理学思想阐经的表现，作者这种阐经的方式是很草率的，以义理推测历史往往会出现诬史的情况，如庄公八年，“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①”一条，历来有两种史实的解释，一是鲁国之师在郎地驻扎等候陈国，蔡国军队的援助，并一起伐邾；二是鲁国军队在郎地等着攻伐陈国和蔡国。在没有任何历史考据的前提下，黄仲认为此事的前年，鲁国与陈蔡两国共同出征而没有嫌隙，因此第二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接着，黄仲炎又更加大胆地分析陈蔡二国之援未到的原因，是因为鲁邾同姓，鲁伐邾是不道之兵，因此陈蔡二国不愿助纣为虐，黄仲炎以孟子性善论的角度猜想陈蔡二国的动机，正是由于“礼义之心，人皆有之，其所以失是心者，或迫于势力而不能自持尔，至于势力之所不迫，则其理义之心未尝

^①《春秋通说》，页 31。

不存也。^①”同样也能合理的解释陈蔡随齐鲁伐卫纳朔的不道行为。

除了以理学思想来解经外，黄仲炎有时以意度史，用后世之情理衡量前世之史实，此则为疑古过度。如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②”一条，三传都认为许止在进药的时候没有尝药而造成君父的死亡，因此罪不在许止，但黄仲炎却用汉代霍光夫人用药鸩杀许后的史实来驳斥，认为圣人之心，不可能罪疑从重，“盖止进药而药杀，是杀不以刃而以药也。^③”因此原圣人经意与后世历史比照来看，真实的情况当是许世子药杀其君父。

大体看来，黄仲炎解经的武断之处在于以义理和情理去揣摩历史情况，而缺乏严密的实证，但是他虽然不遵汉代家法，解经有臆断之嫌，亦能代表以义理为尚的宋代阐经的新趋向，反映宋儒的一般心态，对于研究宋代的思想史也有一定的意义。

3 比附史实，经史互证

黄仲炎的《春秋通说》的最大特点在于经与史的互相发明。以后世之史佐前代之经，实际上是作者想要达到借助儒家经典来指导观照现实政治，经史的互证使经在政治的意义上更重要。如隐公四年“卫人立晋^④”一条，用唐代方镇废立出于士卒来比附，引出“下人置君者，大乱之道也。”又如隐公五年“五年春公矢鱼于棠^⑤”一条，用秦始皇幸瑯琊候鱼而射，汉武帝自寻阳射蛟江中来比附，引出君主不可“恣情纵欲，极于乐。”的警戒；又如庄公二十九年“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⑥”一条，用范仲淹兴工役济民艰之事比附，来引出“以其用民力为己悉矣，故圣人恶而书之也”的大义。

这种经史互证的解法，能看出来黄仲炎希望以经为准，以史为戒的通史观。

二：《春秋通说》的思想

1 崇王黜霸

黄仲炎崇王黜霸的思想反映了宋儒的一般思想，宋儒崇尚王道，认为霸道是人心与政治流于利欲的表现。黄仲炎在自序中点出孔子作《春秋》本意，而实际上是黄仲炎自己对《春秋》的理解：“若夫笔削有法而训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重内而轻外，辨礼之非，防乱之始，畏天戒，重民生，为万世立治准焉”。其中崇王黜霸的思想在其书中体现的

①《春秋通说》，页 32。

②《春秋通说》，页 119。

③《春秋通说》，页 119。

④《春秋通说》，页 8。

⑤《春秋通说》，页 8。

⑥《春秋通说》，页 44。

十分明显，且与三传中对齐桓晋文霸业的正面评价截然不同。三传对于齐桓晋文虽然褒贬兼具，但都赞扬他们攘夷救溺的事功，三传注文将霸业与德性始终相勾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霸主在某一段时期的正面形象，相关的记录书不胜数。而黄仲炎则以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的观点作为自己评价，呈现出原心定罪的特点，他在相关的事件评述中，并不执着于春秋叙事中细琐礼仪的褒贬，即使经书中所记载的事件中，其结果尽管在“临天下言之”的视域中是符合义的，但其动机如果不纯，不合道义，也会遭到作者的贬斥。这种评价直指人心，从个人修养出发，从“内圣而外王”的思维理路出发，证明齐桓晋文为代表的霸主与霸业在“道”上缺乏正当性。如僖公四年，齐国率七国之师侵蔡伐楚后，与楚盟，即“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一条，《公羊传》对此的态度是“喜服楚也”“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①”。《穀梁传》的态度是“内桓师也^②”，而黄仲炎的态度则相反，在此事件中贬斥齐桓与管仲，一是责楚的理由不当“不得其要领而止，盖蹈乎薄德之讥也”。二是认为盟约的结果不惬人心“亦止曰同好而已”。黄仲炎认为两处不当实是齐桓有意为之，“其意常乐天下之多事而以号召排拯为功焉，犹货医者幸人之有疾，贪将者喜国之有寇，故其不以侵陵问楚者，留其疾而遗之寇也，是以既盟之，后明年楚灭弦，又明年楚围许，又明年楚灭黄，兵车徜徉，比召陵以前不少挫，而齐为楚故以勤诸侯者自若焉，夫使诸侯不能一日不虞楚之患，即不能一日不藉齐之功，此管仲之术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③”齐桓动机不纯，故而其霸业也不能有始有终，相关评价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有趣的是，有关齐桓晋文之事的条目下，黄仲炎总是在最后不胜其烦的重申一句：“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这种评价标准受到理学中重视个人修养以期内圣外王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很大。

2 重视伦理

黄仲炎《春秋通说》的伦理思想一大特色是对于纲常范畴中双方的共同规范与义务，而非是以君父夫兄对另一方的绝对地位为基础进行单方面的礼教批判。如在君臣一纲中，除了对为臣者不臣外，黄仲炎还上升到了对天子失范的批评，如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一条，黄仲炎解道：“天子在上，闻天下弑逆之贼而不能讨也，于是卫齐之臣子愤而讨

^① 《春秋公羊传注疏》，页 394。

^② 《宋本春秋穀梁传注疏》，页 19。

^③ 《春秋通说》，页 51。

之，以见天子之失刑也^①”。父子一纲中，如隐公四年“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一条，黄仲炎除贬斥州吁之罪外，还对卫庄公进行了批评，因为“左氏载，卫州吁有宠于庄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碻谏而弗听，既而立桓公，故州吁弑桓而代之，立桓之见弑，由庄之不早辨也，骄其子而不教，恣其弄兵而不禁，虽恶物丑类，天稟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远矣，为人君父者可不戒哉^②”。在夫妻一纲中，齐襄公与文姜之事导致鲁桓公的被害，黄仲炎批评了桓公不能制其始，丧失夫道。兄弟关系中，如庄公九年“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依照“亲亲之意”，桓公不必追杀子纠，但是桓公还是“取而杀之”，足见其不仁。

《春秋通说》中有很多扶持伦理纲常的思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对于失德违礼的行为，黄仲炎都进行了毫不避讳的批评，目的是要“存天理，厚人伦”，体现了他对伦理的重视。

3 民本思想

《春秋通说》还体现了黄仲炎的民本思想，这或者与他信奉《孟子》思想有关，黄仲炎解经时大量引用《孟子》中的话来作为评价标准，他对小民，民生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并且将民本思想融入到春秋褒贬教戒的评价体系中。尤其在战争中，不仅会造成大量伤亡，还会劳民伤财，耽误农时“无故疲民三时，不仁甚也”。如襄公七年“陈侯逃归”一条，以陈侯逃归而晋悼公不能恤推出“凡为人君不能恤其民而致民之叛者，亦不得以自恕其责而惟民之责矣^③”。作者还否定了当时的统治者圈禁山泽，与民争利的行为，如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鄆”一条，“今障护而专其利，使民不得共之，岂为民父母之意哉，悲夫后之为国者，尽笼山泽之所出，归诸公上，榷禁严密，民以抵冒刑戮者，岁不知其几也。^④”当君主被弑，一定的原因也在于君主混乱，致国人苦之，才能使弑君者有机会，如桓公时“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一条，黄仲炎将罪责归于殇公“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马，督爲太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于是杀孔父而弑殇公，由此观之殇公之祸，盖在于屡战而民不堪命者爲之故也^⑤”。臣弑君例子，作者虽然对乱者有所贬斥，但更多的是对致乱者自身的批判，《春秋》中集中在君主自身的荒淫与穷兵黩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本的思想。又如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作

^① 《春秋通说》，页 8。

^② 《春秋通说》，页 7。

^③ 《春秋通说》页 102。

^④ 《春秋通说》页 44。

^⑤ 《春秋通说》页 16。

者的民本思想体现的更加清楚，“夫岂以国小为患哉，若使其有德于民，而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虽去之，而民怀恋当如邠人从太王于岐山之下，归者如市，今纪侯咸无是焉。”^①黄仲炎借《春秋》表达对统治者不断征伐，淫逸骄奢等行为不满，这种民本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南宋末一介平民对时政的呼吁。

4 华夷之辨

在《春秋通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常常借释经表达对于当时两宋与辽夏金外族的战争外交中的态度，民族自尊心的刺激使黄仲炎之类的士人对华夷之辨异常严苛，议论中也常有大量比附时事的内容。严华夷之辨首先是坚持华夷不杂居，如文公八年“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一条，黄仲炎评述道：“伊洛瀍涧，中原之近境而谓之雒戎者，盖戎居其间也，案左氏僖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宣三年，楚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盖戎周伊雒之地，往往皆戎居之，故圣人恶而书之，为后世华戎杂处之戒也，自此义不明而后世有因匈奴日逐之至而建南廷以安纳之，如汉世祖者矣，徙武都之氐以实关辅，如魏太祖者矣，此春秋之学所以不可不讲也。”^②以华事夷更为可耻，如僖公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一条，“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则是欲藉楚之力以合诸侯也，奸盟犯义至此极矣，后世人君有苟图得志于天下而不惮于结外兵如唐高祖之于突厥，石晋之于契丹者皆宋襄之徒欤。”^③这种思想至于其极，连与夷盟都认为是不可以的，如隐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两条，黄仲炎评道：“隐盟戎不至，此何以至，谷梁子曰危之也，是不然，等盟戎尔，危桓而不危隐，其说不通矣，盖春秋之义中国与戎盟耻也，隐不至，隐犹有不得已之意焉，桓策勳于庙，是不耻其所耻，故即其实而至之也，此义明则中国不得以和戎为功矣，故富郑公弼奉使契丹增币以讲好而终身耻道其事，岂非有得于春秋之义哉，凡公返行而策勳饮，至则书，否则不书。”^④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华夷之辨是黄仲炎《春秋通说》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对《春秋》尊王攘夷思想的继承，更是民族矛盾冲突的历史现实的选择。

三：小结

除以上所列的特点与思想外，黄仲炎对于《春秋》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看法，如对于《左

^① 《春秋通说》页 30。

^② 《春秋通说》，页 75。

^③ 《春秋通说》，页 62。

^④ 《春秋通说》，页 5。

传》的作者，黄仲炎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左丘明是孔子的前辈，因此不可能为《春秋》作传，左氏应当是楚国左史，传《春秋》的人应当是楚左史倚相之后，因为《左传》中记录的有关楚国的历史比其它国家更为详备。

大体来看，黄仲炎的思想是继承中唐以来疑经传的风气，在宋代理学和民族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塑造的，通过探析黄忠炎的解经思想，不仅可以了解《春秋》学在学术史上的内在发展脉络，更能了解南宋末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般士人之思想心态。

参考文献

- [1]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 [2] [汉]何休注 [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3] [晋]范宁注 [唐]杨士勋疏《宋本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 [4] [宋]黄仲炎《春秋通说》，清通志堂经解本。

Huang Zhongyan'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mmentaries" characteristics and ideological temptations

Cao Jiaojiao

(Hunan University, 410000)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deas of Huang Zhongyan'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mmentaries" of the Song Dynasty were jointly shaped in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fierce ethnic contradiction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threefold: First, doubts and doubts are passed down, praise and criticism are dethroned, and religious precepts are established; second, they are conjectural and conjecture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arbitrary; third, they are compared with historical facts and mutually corroborated by history. There are roughly four ideological interests: one is to worship the king and depose the hegemon, the second i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thics, the third is the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and the fourth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i and Yi.

Keywords: Huang Zhongyan ,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mmentaries, Characteristics and ideas